

# 产业扶贫何以可能

## ——湖南省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的启示

田 鹏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 南京 211800)

**摘要:**以湖南省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为例,系统性考察资金、贫困人口、项目、市场的衔接机制及其实施路径。首先,“资金跟着贫困人口走”,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元化、现代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其次,在充分发挥致富能手领头羊作用的基础上,以扶贫项目和优势产业为核心抓手,实现“致富能手带着贫困人口跟着产业项目走”;最后,“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运作基础上充分保障贫困户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产业扶贫;“四跟四走”模式;实施路径;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01(2018)01-0059-06

## Why I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ssible

——The Inspiration of the “Four Following”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Huaihua of Hunan Province  
TIAN Peng

(Law School of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model of the “Four Following” in Huaihua of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capital, the poor population, the project and the market and the way to realize it. The first is “funds following poor population”, in which we actively explored diversified and modern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recise recognition of poverty. Secondl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rich hotshot and ta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and industries as the core of the starting point, we realized “rich hotshot following industrial projects accompany with the poor”. The last is “industrial projects following the market”, in which we taking the market as the guide to adjust industrial layout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oor households were fully protected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

**Key word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ur following” mode; Realization path;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湖南省怀化市地处湘西南部,下辖13个县市区,其中,沅陵、通道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方、沅陵、辰溪、溆浦、会同、麻阳、新晃、芷江、靖州、通道等10县为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洪江市、洪江区、鹤城区为湖南省政府确定的比照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脱贫任务艰巨。2015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为86.81万人,2015年全市减少贫困人口14.41万人,2016年减少贫困人口16.92万人,2017年预脱贫14.97万人,预脱贫退出贫困村186个。怀化市产业扶

贫、金融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在全省乃至全国形成了亮点,其中,产业扶贫深入推进,截至2016年底,怀化市将5.68亿元以“四跟四走”的产业扶贫方式用于发展扶贫产业,其中帮扶到户资金4.3亿元,帮扶贫困户15.7万余户。

基于怀化市扶贫工作的实地调研,以“六个精准”为切入点系统性考察“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的实施机制,包括贫困人口瞄准机制、致富能手带动机制、产业项目市场导向机制等一系列系统性实施路径,一方面,“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基层政权建设、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农村社会管理能力与综合治理体制等多个层面的理论课题,能为学术界精准扶贫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经验素材,为进一步深化扶贫开发理论研究提供了学术土壤;同时,“四跟四走”精

收稿日期:2017-09-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RK008)

作者简介:田 鹏(1986—),男,讲师,博士,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精准扶贫的成功实施必须强化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政府的扶持引导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的参与作用,积极培育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另一方面,“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实施机制和实施路径中既是怀化市的有益探索—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也是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行动,能够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开发新路径和农村发展新模式。

## 1 “四跟四走”实施路径

从“八亩山地做文章”到“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的成功实践,怀化市精准扶贫工作创新路径首先从制度上、体制上去寻找切入点,开启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扶贫模式的新路子—“四跟四走”:资金跟着贫困人口走、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手走、致富能手带着贫困人口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而作为一项涉及多元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四跟四走”以简政放权为重要抓手,以转变生产方式为精准扶贫动力体系的内生要素,积极推进新型微型城镇化和“互联网+”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并依托一直忠诚可靠的基层党支部队伍,从而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概而言之,“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施体系是一个辩证关联的有机体系,是推进“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略任务的重要举措和关键步骤<sup>[1]</sup>,其核心就是要把精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并建立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就学理层面而言,“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践模式实质是解决贫困户如何有效对接市场的现实困境,换言之,在“后乡土社会”(Post-earthbound Society)的当今农村,扶贫工作的实质仍然是贫困户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和可持续的发展机遇,即在现代市场社会里如何保障贫困户获得人力资本提升及其相应的职业收入。具体而言,一方面,分散的贫困户与市场对接存在高额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较弱等现实原因,贫困户个体独自对接市场并不具有天然优势<sup>[2]</sup>,换言之,理性小农对接现代市场的结构性困境是“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践模式的理论逻辑起点和实践出发点;同时,如何组织分散的贫困户与高效的市场进行公

平交易,因传统乡土社会中缺乏“自组织机制”(Self-organization Mechanism)而面临组织空白的现实困境,使得乡村精英或村庄能人具有弥补农户对接市场的功能缺失,例如基于传统乡土社会熟人关系产生的舆论压力可以进行交易成本控制、搭便车等不利于市场交易、增加交易成本的常见行为;再如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传统社会纽带产生的人情面子、乡村伦理等乡规民约可以有效实现组织内部监督、激励、惩罚等功能<sup>[3]</sup>;另一方面,乡村精英或村庄能人通过扶贫资金的金融化实现扶贫开发项目的市场化运作<sup>[4]</sup>,从而有效保障扶贫资金转化为脱贫资本,并基于利益共享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帮助贫困户实现可持续的脱贫致富。

一言以蔽之,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践模式实质是解决贫困户如何有效对接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实践困境。

### 1.1 资金跟着贫困人口走

第一,贫困人口是“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切入点,因此,精准识别解决“谁是贫困人口”就成为“四跟四走”实施路径的首要维度。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按照2 300元(2010年的不变价格)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为7 017万人。”怀化市采取严格标准、严格政策、严格程序的“三严”要求详细制定了“一评、二审、三公示”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工作程序<sup>[5]</sup>,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方法—“一看五评法”,即“看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评住房条件、生产资料、劳动能力、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同时,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制定详细脱贫摘帽精准管理实施方案—贫困户的“四个一”和贫困村的“六个一”。具体而言,贫困户的“四个一”是指“一户一本扶贫手册、一个扶贫计划、一个扶贫责任人、一个扶贫公示牌”;贫困村的“六个一”则是指“一村一个扶贫驻村工作队、一个扶贫规划、一个扶贫产业基地、一个办公场所、一套台账资料、一个信息管理平台”,并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确保贫困人口有进有出、扶贫目标动态可控。因此,改革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并完善贫困的识别机制<sup>[6]</sup>就成为“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实施路径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障。

第二,构建多元联动体系解决“资金从哪里来”。为解决传统扶贫工作“大水漫灌”、“给钱

给物、打卡到户”、“扶富不扶贫、扶强不扶弱、扶农不扶贫”等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sup>[7]</sup>，怀化市建立健全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联动机制体系，通过政策资源整合机制、多元治理的扶贫主体责任机制、构建产业发展—教育培训—异地搬迁—生态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多维一体资金整合平台，积极发挥财政转移支付、政府担保贴息、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等杠杆作用，支持并引导社会资本设立投资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企业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示范区创建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按照不低于上年度地方财政5%的比例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金，按照政策整合涉农资金，整合的涉农资金直接用于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原则上不得低于70%，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0%以上用于扶贫产业发展，其中70%以上直接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同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每年撬动50亿元以上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入到扶贫开发工作中。因此，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加强资金整合及在金融方面创新到户机制<sup>[8]</sup>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就成为“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实施路径的另一重要前提条件和保障机制。

## 1.2 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手走

第一，如何组织贫困户通过资本下乡和部门下乡实现经济组织化、效益市场化就成为“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施路径可持续性不可回避的问题<sup>[9]</sup>。因此，培育新型致富能手解决了“贫困人口跟着谁走”的问题。作为“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助推器，新型致富能手既包括创业能手、技术能人、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党支部能人等在农村创业致富方面懂市场、会经营、能吃苦、踏实干的自然人，也包括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社、农业专业技术合作社等组织法人。一言以蔽之，能在“四跟四走”实施路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能人效应”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多维脱贫主体合力效应最大化和最优化<sup>[10]</sup>。《方案》明确指出，实施致富能手“双培双带”计划，把致富能力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增强党员带头致富、带领贫困人口致富的能力，把党员致富能力选进村支两委班子，每个贫困村培育5~8名致富能手，并开展“一人学一技”活动，每名乡村干部学习一门以上实用技术，提升技术服务群众的能力；开展致富能手，包括自然人、法人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企业等扶贫经济主体的认定工作，选择成熟产业、优质企

业、优秀能人，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形式，与贫困人口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和效益共享机制。因此，类似属于驻村式帮扶的多元化致富能手就成为“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施路径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推力<sup>[11]</sup>。

第二，目前，各地实践中的精准扶贫面临着乡村内平均主义思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村庄间贫困户实际识别标准差异等现实困境和实践挑战<sup>[12]</sup>。因此，“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通过健全利益联动机制解决了“贫困人口如何跟着致富能手走”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坚持市场引导、产业引领、依法自愿的原则，找准贫困人口与致富能手的利益联结点；另一方面，建立基于市场机制、契约精神的利益联结和保障体系，从而使得“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有效解决了扶贫实践中“贫困人口如何跟着致富能手走”的问题。怀化市的具体实践措施包括：1. 直接帮扶。直接帮扶是指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对有产业发展愿望和产业发展能力的扶贫对象，直接参与区域特色产业开发。2. 委托帮扶。委托帮扶是指受扶贫对象个人或集团委托，通过购买扶贫社会服务方式，将国家给予特定对象的扶持资金直接委托给有意愿合作的、有社会责任的、讲诚信和有实力的扶贫经济组织。3. 股份合作。股份合作是指根据扶贫对象个人或集团意愿，鼓励探索将扶贫对象户的政策扶持资金、土地、林地和水面等生产资料折价入股，由扶贫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和生产经营，结成联股联利的共同体，实现股份到户、利益到户。

## 1.3 致富能手带着贫困人口跟着产业项目走

第一，产业项目是“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施路径的重要抓手。随着“项目治国”时代的全面到来<sup>[13]</sup>，“项目进村”不仅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实践载体和操作平台<sup>[14]</sup>。“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正是在此现实背景下提出的一种系统的新型产业扶贫体制机制。作为习近平“五个一批”脱贫攻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扶贫是指在贫困地区建立农产品基地，或者通过订单农业等多元化手段和措施带动贫困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经济收入的一种新型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形式<sup>[15]</sup>，主要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延伸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增值转化，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家庭经济收入<sup>[16]</sup>。一言以蔽之，从某

种角度而言产业扶贫是一种区别于输血式救济扶贫的造血式开发扶贫<sup>[17]</sup>。怀化市科学编制和有效推进贫困村特色产业培育计划、扶贫产业园示范基地建设计划、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计划等<sup>[17]</sup>,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产品深加工、观光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优势产业,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积极引导和支持村级经济组织通过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一体化农业生产基地,通过直接投资、参股经营、提供技术服务、签订供销合同等方式带动贫困人口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第二,优势产业是“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的核心要件。虽然实践中的扶贫开发项目运作仍然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如扶贫资源碎片化、扶贫实践与扶贫治理目标相悖等问题<sup>[18]</sup>,但怀化市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个产业基地、一户一个脱贫产业项目”的要求,抓好扶贫产业可行性研究,大力发展战略种养、农产品深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商贸物流等优势产业,2016年在全市创建首批100个“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示范点并加快实现全市全面铺开和全域全面覆盖,建成1237个扶贫产业基地,建成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和13个县级产业园区,把全市整体建成“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示范区,主要发展的优势产业包括:制种产业、名优茶产业、特色水果产业、油茶茶叶、蔬菜产业。

#### 1.4 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

第一,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产业扶贫的基本动力和核心机制,市场机制是精准、综合、可持续农村开发扶贫战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sup>[8]</sup>。具体而言,一方面“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明确要求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并从供给侧改革入手,以消费需求引导生产供给、以消费者需求确定市场供给,最大程度提高扶贫项目经济效益,最低程度降低贫困户市场风险;同时,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家庭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进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农企对接,加快农产品市场体系、物流配送体系、电商服务平台建设,并积极鼓励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市场三者间联结机制,采取与贫困户签订保底收购价、上浮结算等方式有效解决“生产容易销售难、增产容易增收难”等

扶贫实践困境<sup>[12]</sup>,从而在制度上保障贫困户能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并降低市场风险。

第二,制定贫困人口参与扶贫产业发展利益联结协议审核监督机制。如何有效克服传统农村扶贫中的“精英俘获”(Elites Capture)问题是全面实现小康战略布局大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sup>[19]</sup>。“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要求扶贫开发项目提高贫困户进入市场之组织化程度的同时,必须有效解决传统扶贫工作中的“扶富不扶贫、扶强不扶弱、扶农不扶农”等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因此,怀化市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科学有效地防范并化解扶贫产业项目市场化运作风险。一方面确保贫困户与扶贫经济组织形成休戚相关的利益联结和利益共同体,为贫困户建立利益维权和申诉表达机制,指导和帮助贫困户维护合法权益,尊重贫困户自主选择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采用多元化维权形式充分保障贫困户平等参与权和平等收益权,如扶贫经济组织与贫困户签订互利共赢经济合同,由项目区贫困户选出代表组成监事会并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常态化审计工作,并对扶贫产业项目投资经营收益进行全程监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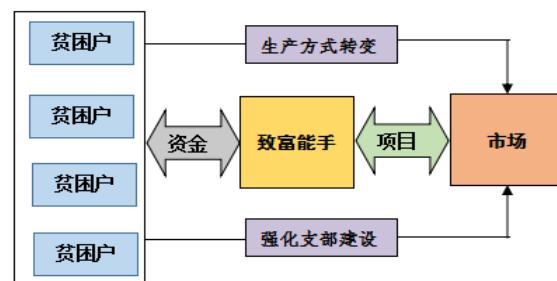


图1 “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施框架图

#### 2 “四跟四走”实践启示

作为打通扶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的成功是涉及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农村治理体制等维度配套改革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要打通扶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必然要求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sup>[20]</sup>。而“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在下述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性和启发性。

首先,“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元化、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方式。一方面,怀化市进一步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抓住了精准扶贫制

度创新的“牛鼻子”,做实村级资产并量化到户,为“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手走”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怀化市各村级组织充分发挥“村社理性”这一中国改革的比较优势<sup>[21]</sup>,进一步放活贫困户土地承包权和致富能手土地经营权,为“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手走”提供了实践空间和实现可能。一言以蔽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是“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

其次,“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在充分发挥致富能手领头羊作用的基础上以扶贫开发项目和优势产业为核心抓手,实现“致富能手带着贫困人口跟着产业项目走”。一方面,基于区域社会贫根的精准识别,怀化市以扶贫开发项目为载体实现输血式救济扶贫向造血式开发扶贫的彻底转型,让有限的扶贫金融资金和产业项目资源最大程度实现精准扶贫应有的社会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四跟四走”扶贫工作模式将扶贫项目开发与乡村本土资源有机结合,通过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商贸物流等优势产业既能实现贫困户脱贫摘帽,也能帮助贫困村在新型城镇化浪潮中实现乡村复兴。

最后,“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在市场机制运作基础上充分保障了贫困户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扶贫扶心”。一方面,“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要求扶贫开发项目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扶贫开发项目带动区域产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性扶贫;另一方面,制定贫困人口参与扶贫产业发展利益联结协议审核监督机制,既能有效克服传统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扶富不扶贫、扶强不扶弱、扶农不扶贫”等一系列“精英俘获”困境,又能提高贫困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

当然,“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虽然在实践中成功解决了贫困户、资金、项目、致富能手和市场的有效衔接,但并不意味着该模式尽善尽美,更不能简单地将其复制到其他区域,换言之,“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在怀化市取得应有的政策功能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并不能将其简约化为一种通则性实践模式,不仅因为怀化市特殊地域社会类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道路决定了“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和地方特色,还因为目前该模式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和学理论证阶段,并不具备将其复制成可操作

化之通则性规则推而广之的完备条件。因此,“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在怀化市获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但仍然面临推广的问题,在优势产业不明显或特色产业暂未取得发展的区域,该模式是否仍然适用也是进一步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因此,“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仍然无法回避可持续性的实践考量和市场风险分担机制的学理拷问。一方面“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性是其不可回避的挑战,包括贫困户的动态精准识别、金融资本、项目资金、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就学理层面而言,贫困户如何平等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尤其是贫困户中的弱势群体或“脆弱性人群”(Vulnerable Groups),如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不仅需要大胆的实践尝试,更需要在理论层面论证既有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换言之,基于谁的利益最大化进行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就不仅仅是一个实践中的技术问题,更是学理意义上的权利问题。因此,“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既有的利益分享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学理合法性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论证。

#### 参考文献:

- [1] 辜胜阻,李睿,等.推进“十三五”脱贫攻坚的对策思考[J].财政研究,2016(2):7-15.
- [2]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13.
- [3] 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7.
- [4] 苑鹏.“公司+合作社+农户”下的四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探析——从农户福利改善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3(4):71-78.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北京,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 [6]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 [7] 万兰芳,向德平.精准扶贫方略下的农村弱势群体减贫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46-53.
- [8] 陆益龙.构建精准、综合与可持续的农村扶贫新战略[J].行政管理改革,2016(2):26-30.
- [9] 全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J].开放时代,2009(4):5-26.
- [10] 尹广文,崔月琴.能人效应与关系动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一组基于西北地区村域合作社的实地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 (2):26-33.
- [11] 王晓毅.精准扶贫与驻村帮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1):56-62.
- [12] 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 [13] 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45-182.
- [14] 付伟,焦长权.“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J].社会学研究,2015(2):98-123,243.
- [15] 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2.
- [16] 杨道田.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创新路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8.
- [17]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脱贫攻坚政策解读[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2.
- [18] 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项目的运作困境及其解释—以华北W县的竞争性项目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9-56.
- [19] 刘源.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减贫:以乐施会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99-108.
- [20] 胡应南.创新之路—湖南省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8.
- [21] 何慧丽,邱建生,高俊,等.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6):39-44.

(责任编辑:王昱)